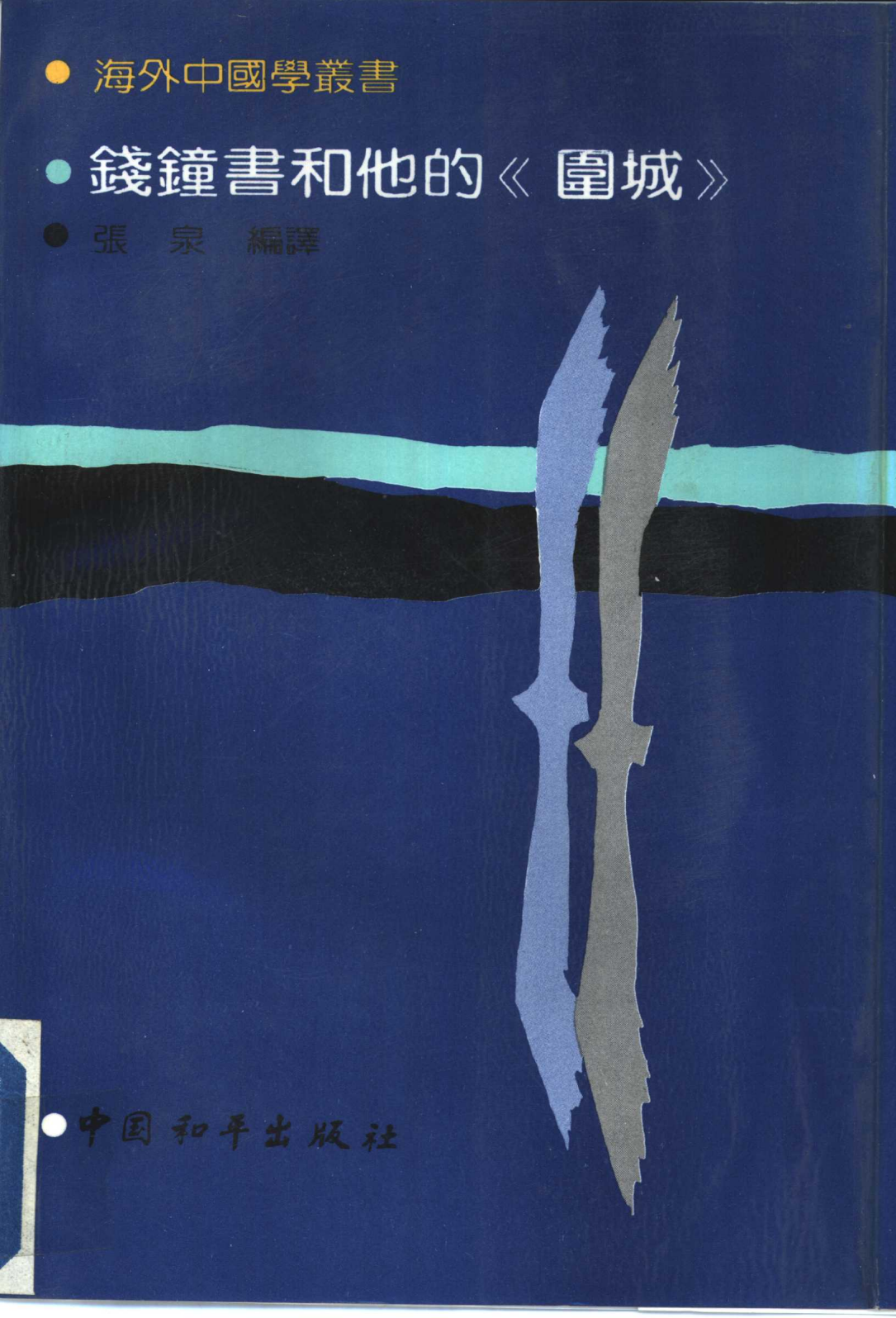


● 海外中國學叢書

● 錢鐘書和他的《圍城》

● 張 泉 編譯

● 中國和平出版社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美国学者论钱钟书

编者：张 泉

译校者：舒 明 陆文虎

刘苏雅 张 泉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086号

钱钟书和他的《围城》

——美国学者论钱钟书

张 泉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小乘巷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1/32 11.125印张 200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7-80037-605-2/G·401 定价：4.50元

责任编辑：伏 琥

封面设计：李吉庆

目 录

《海外中国学丛书》序	季羨林(1)
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	张 泉(7)
论钱钟书的小说	夏志清(30)
《围城》英译本导言	茅国权(54)
评《围城》英译本	胡定邦(74)
反浪漫主义作家钱钟书	耿德华(90)
钱钟书论	胡志德(115)
·前 言	(116)
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120)
第二章 批评论文	(132)
第三章 《谈艺录》	(157)
第四章 散文	(189)
第五章 短篇小说	(215)
第六章 《围城》	(238)
第七章 简短的评价	(277)
注释与出处	(280)
钱钟书著译目录	(304)
钱钟书研究评介资料索引	(317)

《海外中国学丛书》序

季羨林

国内从事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老一辈的学者们，一定都还能记得，五六十年前冯承钧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法国中国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译文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当时中国学已流布全世界，但是在东方以日本为魁首，在西方则以法国为巨擘。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这两个国家以外，瑞典的高本漠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所欣赏。英国的A. waley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译文优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国学家，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些中国学家，对弘扬中国文化，加深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多半都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至今还为中国人民所阅读，所欣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外国中国学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又能超越我们呢？也许还有人认为，中国语言只有我们中国人最能掌握运用，其他国家的学者总不免有隔皮猜瓜、

隔靴搔痒之病。不是有的外国中国学家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吗？不是也有外国中国学者把六朝隋唐时期习见的“诚如来旨”译为“诚然是我佛如来的旨意”吗？

这些都是事实，无可否认。我甚至还能举出更多的这样的例子。这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繁难。连我们自己的学者也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但是，总起来看，我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瑕不掩瑜。心理学家常讲一个现象：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住久了，住惯了，对他周围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反不如一个外来人，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事物特别敏感，他能一眼就看到别人不注意的现象。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够证明，心理学家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旁观者清”，也证明同一个事实。

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外来人”、“旁观者”。他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事物。

此外，还有一点，我也必须着重指出。就拿上面谈到的西域南海的研究来作例子吧。五六十年以前，我们对西域南海的研究水平，远远比不上外国学者。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多半不通；与这些地方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多半不能掌握。我们除了能读中国史料以外，缺的东西太多，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不通语言文字，不能掌握必要的资料，能读懂古代汉文典籍吗？因此，当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的时候，我们都由衷地感激他，法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的。这一套丛书，第一册出版于1932年，最后一册1958年出版，前后相距20多

年。没有需要，能做得到吗？法国之外，日本学者关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翻译了不少，比如关于《大唐西域记》、《法显佛国记》等等的著作，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些译文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可惜好景不长，冯承钧先生之后，后继乏人，像冯承钧先生这样毕生勤勤恳恳，翻译不辍的“有心人”，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西域南海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连外国学者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自己有了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古话到了今天仍然是真理。如果多了解一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肯定会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的。我们翻译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部巨著，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外国人民对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巨大贡献的认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然而这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吗？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除了李约瑟的著作以外，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注意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几乎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名山事业。结果是某一些研究工作者视野不广，囿于成见，固步自封，难有新意。这当然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展开。每年都召开一些什么什么国际研讨会，专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多半是热热闹闹一阵，吃吃喝喝一番，长城、桂林、兵马俑，茅台、烤鸭，满面春

风。即使留下几篇论文，也多半是应景之作，从中难以窥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之全豹，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深，也不能持久，对我们没有多大好处。

最近我给极受读者欢迎的《文史知识》提意见时，曾讲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史学界多注意外国同行们的研究动态，多阅读人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这个意见颇受到同行们的重视。时至今日，我们提倡改革开放；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开放肯德基、米尼姆、卡拉O.K.、万宝路；可口可乐、T恤衫、耐克旅游真耐穿；而对人家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则漠然置之。我这个比拟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一般说来，真正埋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对卡拉O.K.之类，不一定有多大兴趣。我只不过想指出这种风气之十分不正常而已。

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的头脑会清醒一下的。全国人民，特别是学者们，都在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曾普照西方大地，全世界文化的发展皆蒙其利。这一点没有人敢予以否认。因此，现在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弘扬什么呢？又怎样弘扬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章法。有一位同行说了一句似乎是俏皮但实则含义深刻的话：“出口转内销。”他指的是，国外正在兴起一股研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的高潮，这一股高潮“波撼岳阳城”，也撼动了我们赤县神州。原来出口的东西又转销到国内来了。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我们应该竭诚欢迎，大力响应，这对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经常考虑在人类历史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发现，几千年以来，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迭兴替，互为补充，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19世纪初叶一直到今天20世纪末叶，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也不能万岁千秋。这个文化现在已经露出了不少破绽，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迹象已经萌出。西方国家，特别是那几个世界大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露出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兴趣渐浓。研究印度学的人，从历史语言的考证转向大乘佛教和佛教密宗；研究中国学的人，兴趣渐渐集中到《周易》、《老子》、《庄子》，以及禅宗的研究上来。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原因并不难找。西方学者中特别敏感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了点穷途末日之象，济之之方无他：转向东方文化。

回看我们中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似乎还如凤毛麟角。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唤起大家的注意。唤起的方法多种多样，出版这样一套《海外中国学丛书》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它至少能起到当年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已经起过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能够互通声气；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真正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能改变一下当前这种闭塞的情况；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投石击破水中天”，能投出一块这样的石头。总之，作用是很多很多的。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带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我个人认

为，这是雪中送炭的工作，但又何尝不能理解为是锦上添花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希望。
是为序。

1991.1.2

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

张 泉

像许多聚合着深广的政治、社会或文化内涵的伟大人物一样，钱钟书成为一种“符号”，一种“现象”。现象(phenomenons)者，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如果作进一步的辨析，那么它的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可观察的事物；特殊的或反常的事物，尤指才能出众或引人注目的人；事物引发的可感知印象或材料，同事物本身的特质有所区别。与此相对应，当我们考察跨文化文学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时，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评述。

通常意义上的“钱钟书现象”，像“人名录”(Who's who)中的小传一样平淡无奇、简单明确：各种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辞典、手册已陆续设置“钱钟书”词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只需不断补充上当事者的新的著作和职务，以及新发掘的旧材料。这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影响最为广远的，是第二个层面上的“钱钟书现象”，即有着超常学力和品格的钱钟书，由种种见诸报章的传闻、颂词以及钱钟书本人的表白、反应合成。这个层面上的“钱钟书现象”是动态的，可大略分为三个阶段。

1946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钱钟书在清

华师生以及学术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颇负盛名。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是著名学者吴宓教授的“龙”喻：“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你我，不过尔尔！”（《但开风气不为师》）而在当时，钱钟书只是个离校不久的毕业生。40年代，钱钟书在《Philobiblon》（书林季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书评、文章，其中不少狠狠地挖苦了西方汉学著作的浅薄、误解和歪曲，欧美的不少汉学家注意到他，认为“他不但对中国文学，而且对欧洲各主要国家文学，尤其是法国和英国文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也表现出他对某些倒霉的外国汉学家以及他们的著述毫不客气地予以抨击的脾性。”（《钱钟书——关心意大利文学的作家和学者》）总的来说，钱钟书出类拔萃的才学，还并不广为当时的文坛和社会所知，就连著名编辑出版家赵景深也迟至1943年才听到钱钟书的名字（《文坛旧忆》）。美国学者胡志德（T. Hu-ters）认为，这表明钱钟书避免引起注意的努力十分奏效（《Qian Zhongshu》，1982）。应当说，这种推断是不确切的。青年时代的钱钟书，更多的是“任意臧否人物的狂态”（《忆钱钟书》），还没有“落索身名”的意识。主要原因是他的重要著作还没有出版；在已经发表的5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中，有不少刊发在读者面比较狭窄的杂志上，其中还有十几篇是用英文写的，大多刊印在“The Chinese Critic”（中国批评家）、“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图书季刊）、“Chinese Year Book, 1944~1945”（中国年鉴）以及“Philobiblon”等国内出版的英文书刊中。

这无疑大大缩小了钱钟书的读者群。

1947~1978年为一个阶段。这个时期，钱钟书成为批评和研究的对象。《围城》（1947）和《宋诗选注》（1958）问世之后，都曾引起国内评论界的注意。在见诸文字的10余篇文章中，贬多于褒，有些则是特定时代畸形思潮的必然产物。钱钟书被冷落、遭批评的原因不难找寻。40年代末期，席卷中华大地的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经济建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务之急，大众的文化建设还主要是扫盲和初级的社会主义教育。钱钟书著述的题材、体裁以及欣赏趣味，当然与这种大背景相游离。倒是在这个阶段，钱钟书开始进入美国一些中国学家的研究视野。“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文学史》，1962）专章评介了钱钟书。两部以钱钟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于1977年完成，其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他们对钱钟书大加揄扬，而我们当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其中也包括钱钟书本人。

最后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在这个时期，钱钟书成为崇拜和专门的学术研究对象。他的著作一版再版，广为流传，供不应求。钱著的出版发行状况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借出率充分表明，它们已经开始冲出文人学士的圈子，走出沙龙，成为大众的读物，特别是以《围城》为代表的创作作品部分。钱钟书在人们心目中所构筑的形象，由下列只言片语可略见一斑。

海外学者称，钱钟书是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中国时报》1979年6月16~17日）。钱钟书在《论文人》中有云：“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中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钱钟书在我

们眼中就是个“英雄”人物，他“语气幽默，神思朗澈，不类常人”，他“积学之深，叹为观止”（《南北极》1979年6月）。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若有神助”。他“坐着时间机器，驰骋上下古今中外，遯于艺而不为艺所缚”。我们都是“拜钱的人”（devotees），能够面见，“余死无憾焉！”

（《明报月刊》1979年7月）钱钟书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文人学士”，“能够与他的博学相匹敌的在世者只有极少数人”；不要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学整体的非凡把握，就连他的西方文学知识也“会使许多西方学者相形见绌”。如果给中国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有钱钟书当之无愧，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作家……其著作品位极高”（西蒙·莱斯，1983年。转引自《编译参考》1987年6期）。

进入80年代，国内也开始出现重新描绘钱钟书的文字。举其要者如：

钱钟书经过50年的磨练，“学问愈加精邃，识见愈加深卓，品性愈加纯粹，……终于研治成一家之学，备受国内外爱好学术人的敬佩。”（《读书》1983年1期）钱钟书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昆仑高峰之一”，应当“设一个钱钟书研究所”（《随笔》1986年5期）。读钱钟书的书，“能使旅途变短，生命变长”（《文艺报》1987年2月28日）。钱钟书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前者使他“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后者“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读书》1989年第3期）。

诸如此类的评价，无疑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钱钟书，塑造出需仰视的形象。然而，钱钟书本人“逃名如逃役”的

超然态度，又恰恰与他的本意相反，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于他的好奇、惊叹与崇敬。许多例子表明，对于常人来说是求之不得或至少不会反对的事情，钱钟书却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

恐怕很少有人会阻止自己的“拙著”再版，可解放以后，有出版者打算重印《围城》，被钱钟书拒绝。《谈艺录》也是在出版社一再坚持的情况下，才得以补订重印。我们有的作家大言不惭地说：洋人靠我的某某作品拿博士学位。完全是一副没有他的作品国外就要缺少博士的救世主派头，暴露出无知的自鸣得意与自高自大。而对于海外有人以钱钟书为学位论文主题的讯息，他却一笑置之：博士论文是一项“新兴企业”（dissertation is a growing industry），何足道哉（《南北极》）。对于国内与日俱增的学位论文撰写者的种种要求，他也一律用“无可奉告”作答。对于“钱学”以及相应的组织和刊物，钱钟书全力阻止，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刊’到人死以后。”（《读书》）关心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人，不会不知道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N.G.D.Malmqvist）。当他1985年被选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后，就有人不无兴奋之宣称：“中国的代表”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更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作家打探如何结识马悦然，以便写出用于参加竞争的作品。然而钱钟书在与这位重要人物会面时，仍旧我行我素，在谈话中不时加入拉丁文等语言，惹得这位院士很不自在，认为钱钟书不相信他的学识，是在故意考他。于是他公开表

示：不喜欢钱钟书（《中国时报》）。

这就是钱钟书！缺少了这一部分，也就不成其为钱钟书了。而这一部分更使钱钟书透露出其特异的一面，闪耀出诱人的奇光异彩，赢得了更多的倾倒与仰慕。

钱钟书的这个新的形象只能形成于80年代。我们可以说这是拨乱反正，清算过去的失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结果，还可以说，这是由于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形成了能够开掘新的研究领域的力量。然而最根本的条件是，当我国进入新时期后，也开始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新时期，召唤钱钟书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开始具备。

在考察这个层面上的“钱钟书现象”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谁发现的钱钟书。有人说，钱钟书这样的作家之所以“红”起来，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有人则找出证据，加以否认。其实，争论钱钟书是否是由外国人发现的，毫无意义。在钱学研究领域，不必担心国外有人在“作越俎代庖的推荐”。美国人研究《谈艺录》获得博士学位，并不是“在向中国政府提醒并挑战”。那只不过是美国的外国研究领域中的一项个人研究课题而已。海外学者（主要是美国的几位中国学家）确实较早地对钱钟书的各类著述（《管锥编》除外）进行了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会不对后来者有所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大陆。这种跨文化影响的情况在文学史上是时有发生。例如，美国作家爱伦·坡和福克纳在美国原来并不出名，在欧洲获得极高的评价之后，才又被美国文坛重新接受。这也是无庸讳言的史实。但是，“影响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只能触发。”（转引自钱钟书“Chinese Literature”）现在，仅从数量上看，大陆的钱学研究论著